

「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 以晚清報刊的運用實例為中心*

蔡祝青**

摘要

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的三十年間是「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不論是在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是思想內容方面，皆有突破性的劇變。本文以「文學」二字作為關鍵詞，以晚清報刊的論域作為考察對象，透過檢視「文學」在晚清報刊中的語用實例，來考察近代文學觀念的歷時發展。文章將分兩段時期進行論述：據報刊資料顯示，1901年以前，「文學」相關論述主要由外國傳教士主導，至1902年以降，晚清知識份子則掌握了論域的發言權，關於「文學」觀念的探討，大約可分為三類：其一，借鑑明治日本與歐西學者的文學史觀察，反思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代表人物有梁啟超、王國維等人；其二，透過自編文學教科書，開始定義「文學」，梳理中國文學之發展，代表人物有黃人、林傳甲等；其三，基於「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之宗旨，而欲使「文學」觀念重返中國傳統經史者，代表人物有劉師培、章太炎等人。透過晚清知識份子的論辯與思考，基本上已使「文學」觀念體現從傳統到現代的遞嬗，以待來者續做發揮。

關鍵詞：文學、梁啟超、王國維、黃人、劉師培、章太炎

* 本文為筆者103年度科技部計畫：「近代『文學』觀念的現代化進程——從辭書的規範化到『文學』的語用實況」的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MOST 103-2410-H-002-140。初稿曾發表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英國各大學跨校中國研究中心主辦「中國文化中的關鍵詞及其翻譯」國際學術研討會，2015年1月2-3日。感謝講評人王宏志教授及兩位論文審查人惠賜寶貴意見。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當代歷史學者張灝先生曾提出 1895-1925 年前後約三十年間，¹ 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此時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是思想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所謂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主要變化有二：一為報刊雜誌、新式學校及學會等制度性傳播媒介的大量湧現；二為新的社群媒體——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的出現。而知識階層之所以能對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力，主要是透過創辦報刊，在學校講學或求學，以及在社會中自由結社，參與學會或其他知識性、政治性組織而來。² 關於文學觀念的現代化發展，我們也可放在「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框架中，考察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與知識階層在文學觀念的發展中產生何種助力？對此議題，日本學者鈴木貞美曾在《日本の「文学」概念》一書中針對中國「文學」的歷史進行考察，該文提出作為中國本身既有的詞彙，「文學」一詞曾隨著儒學的盛行，而出現「經學」的傾向，漢代的「文學」基本上是以經書為中心的學術；六朝以降，隨著佛老思想的流行，文學批評與創作受到重視，寫作文章成為專業技能，「文章」之學逐漸獨立，成為該時重要的「文學」內涵；到了近代，學界一般認為中國現代的「文學」概念主要來自明治日本，除了古城貞吉（1866-1949）、笹川種郎（1870-1949）、久保得二（1875-1934）等人的《支那文學史》自 1897 年起陸續出版，1904 年京師大學堂教授林傳甲（1877-1922）也參考了笹川氏的著作，編寫了第一部《中國文學史》。

¹ 關於張灝的「轉型時代」概念，至少經過四期的發展。其中第三期是「轉型時代二十五年說」的出現，指 1895 年至 1920 年；第四期是正式確立「轉型時代三十年」，定義為 1895 年至 1925 年。詳丘為君，〈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成、意、義，與時間定限〉，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 年），頁 529。

²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 年），頁 37、43。

鈴木在文中尤其論及「在中國，『文學』作為語言藝術的意思正式使用開始於 1917 年胡適（1891-1962）、陳獨秀（1879-1942）、魯迅等人發起的『文學革命』。魯迅指出『文學』一詞『並非取自「文學子游、子夏」，而是從日本輸入的，是他們對英語 literature 的翻譯詞。』³ 此論關注從日本譯介而來的文學史與文學觀念對於中國的關鍵影響，時間則在 1904 年與 1917 年。

「文學」成為英語「literature」的對譯詞確實是近代「文學」觀念得以產生現代化發展的關鍵事件之一。對此議題，筆者曾透過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的編纂與流通嘗試描繪學科新名詞朝向標準化、規範化的大致走向，尤其專注於追索「literature」詞條朝向現代化發展的軌跡，關於「文學」兩字，早在羅存德（Wilhelm Lobscheid, 1822-1893）編纂的《英華字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Hong Kong: The Daily Press, 1866-1869*）中首度成為「literature」的對譯詞，後經中日英華辭典傳承而流通甚廣。待顏惠慶（Yen Hui-ching 或 W. W. Yen, 1877-1950）編譯《英華大詞典》（*An English-Chinese Standard Dictionary, 1908*），則使「文學」詞條出現由廣義到狹義，由傳統到現代的豐富意涵。⁴ 至 1911 年，黃人（1866-1913）所編《普通百科新大詞典》已收錄「文學」詞條，文中「除了對文學的特性、風格、體式做了簡要的描述，還涉及中西文學的比較，以及『文學史』的意義等。」⁵ 1915 年，由陸爾奎（1862-1935）、方毅（?-?）等編校《辭源》的「文學」條中，尤能清楚辨析傳統與現代意義，文稱：「孔門四科之一。論語稱文學子游子夏。疏謂文章博學。舊所稱文學皆此義；

³ 詳〔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年），頁 51。

⁴ 詳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 3 期（2012 年 12 月），頁 273-333。

⁵ 詳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收入陳平原、米列娜（Milena Doležalová-Velingerová）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年），頁 176。

今世界所稱文學，有廣狹二義。狹義與哲學、科學相對峙，專指散文、韻文而言；廣義該哲學、倫理學、政治學等言之，亦謂之文的科學。」⁶ 由上述詞條可知，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意義不會晚至1917年的「文學革命」才開始，而文學觀念的現代化發展，除了日本資源，也不可輕忽歐美資源，其中傳教士的漢語實踐尤有不可忽略之功。

論及傳教士之功，李爽學相關論著已有鉤沉，李文主要從明末翻譯與清末文學新知的傳播與建構角度，清楚辨析明清傳教士的傳承關係，研究指出1623年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刊刻《西學凡》、《職方外記》二書，實已提出「文藝之學」，後經1635年楊廷筠（1562-1627）《代疑續篇》傳承艾著，改「文藝之學」為「文學」二字，尤使「文學」擺脫《論語》古義；「文學」新義再經新教傳教士如艾約瑟（Joseph Edkins, 1823-1905）等賡續之，在《六合叢談》中不僅含括西方古來文學文類，同時也兼含西方修辭學內容，使得「文學」今義燦然大備。⁷ 相關研究不僅使「文學」新概念的緣起回溯至晚明，同時也有助釐清明清新舊教傳教士對於「文學」概念的傳承發展，然而傳教士文本中的現代文學觀念曾對晚清知識階層產生何種影響？晚清知識階層如何接受並轉化來自東西洋的現代文學概念，則有待進一步闡揚。⁸

有鑑於文學觀念的發展實由多元複雜的因素共同交織影響而成，

⁶ 陸爾奎、方毅等編校，《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冊上，頁171。

⁷ 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12-443；李爽學，〈八方風雨會「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年6月），頁151-177。

⁸ 如李文中提及，梁啟超（1873-1929）在所創《新小說》中論定「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乃效尤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 B.C.）的《詩學》，是追隨耶穌會與新教傳教士之說。詳李爽學，〈八方風雨會「文學」〉，頁161。然而實際上，1902年直接影響梁啟超創辦《新小說》雜誌，並提出「新小說革命」者，主要是借鑑明治日本政治小說之功。

筆者擬透過近代制度性傳播媒介——報刊，考察報章論域中「文學」的運用實例以體現「文學」觀念在報刊上的發展面向。在實際作法方面，則以上海圖書館「全國報刊索引」系統開發的「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作為主要考察對象，並以「文學」作為關鍵字進行檢索，透過所得再做進一步的歸納分析。在數據庫的選擇上，上海圖書館本收藏有最為豐富的近現代報刊史料，今透過該館開發的「全國報刊索引」，已依序製成晚清及民國期刊全文數據庫，晚清部分尤其「幾乎囊括了當時出版的所有期刊」，⁹ 藉由這套全文數據庫的關鍵字搜索，相信可提供相對可靠與完整的史料，使相關論題得以客觀展現其發展樣貌。另在數據庫史料的解析方法上，經實際檢索所得，共錄得 59 條「文學」的運用實例，¹⁰ 在質與量的雙重考量下，筆者並不進入計量的統計分析，¹¹ 透過初步篩選，先汰除不相關¹² 或傳統用例，再依照時間先後、報刊、撰稿人之次第進行分類整理，求能體現報刊論域中「文學」二字的運用實況，目標在於辨明「文學」作為「能指」（signifier），如何透過晚清傳教士或新型知識份子的運用或

⁹ 詳上海圖書館網站「全國報刊索引」之介紹。網址：http://www.cnbksc.cn/shlib_tsd/product/detail.do?productCatId=6，瀏覽日期：2014 年 12 月 15 日。

¹⁰ 「文學」關鍵字檢索、表格繪製與初步判讀係由本研究之助理陳柏言協助完成，特此致謝。

¹¹ 近年在數位人文研究的提倡下，利用數據庫的統計方法確實帶來極大助益，金觀濤、劉青峰尤有開創之功。參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 年）。但筆者所採用的「晚清期刊全文數據庫（1833~1911）」一來並無計量功能；其次，筆者所研究的「文學」用例，在 1833-1911 年間只出現 59 條用例，只要透過歸納法即可清楚判讀；其三，有必要留意數據庫統計方法帶來的陷阱與迷思！數據庫統計主要依照關鍵字的出現頻率來計量，但卻無法判斷同樣出現「一」次，其代表的意義卻大不相同，如梁啟超文章中的「文學」用例，與名不見經傳的作者或廣告中的「文學」用例，其論述品質與實際帶來的傳播效應，顯然無法等量齊觀。此外，還有同一篇文章出現多次關鍵字的狀況，也有必要調整統計方式，並由研究者回歸文本做進一步的釐清。

¹² 雖以「文學」作為關鍵字進行檢索，但也會出現如〈上海宜設英文學會說〉的篇章，但「英文學會」顯然並非本文所欲探究的「文學」用例，劉青峰教授稱此類檢索所得為「噪音詞」。

定義，而使「所指」(signified)的意涵產生從傳統到現代意義的位移。

我們可分成兩個階段來說明「文學」觀念在晚清時期的發展：一、1901年以前，以傳教士為中心；二、1902年至1911年，以中國知識份子為中心。因篇幅限制，民國至五四時期的發展則有待另文討論。

二、1901年以前的「文學」觀念，以傳教士為中心

在1901年以前出現的「文學」用例不多，最值得注意的是1857年發表於《六合叢談》第1期，由〔英〕艾約瑟所撰寫的〈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其餘文章則來自〔美〕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 1836-1907)主編的《萬國公報》，此報原為林氏自辦，自1889年廣學會成立後，則為機關報，可知此時報刊言論主要由傳教士主導。

艾約瑟為英國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來華傳教士，不僅與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等人共創上海最早的現代出版機構墨海書館(London Mission Press)，也在上海第一份中文月刊《六合叢談》寫下了〈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此文在出版18年後，於1875年1月20日曾由《申報》轉載，同年2月20日《萬國公報》第324卷也從香港《循環日報》選錄轉載，¹³由各報刊間流通轉載的情形，可知其重要性。

文章首言今之泰西各國之「天人理數、文學彬彬，其始皆祖于希臘。」列邦幼童，必先讀希臘、羅馬之書；再以比較文學的角度介紹希臘詩人和馬(Homer, 今譯荷馬，約9-約8 B.C.)、海修達(Hesiod, 今譯赫西俄德，約8-? B.C.)所創詩歌以敘史事，即如明人楊慎

¹³ 〔英〕艾約瑟，〈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六合叢談》第1號(1857年1月26日)，頁4-6；《申報》第840號，第4-5版，1875年1月20日；《萬國公報》第7年第324卷(1875年2月20日)，頁333。

(1488-1559)《二十一史彈詞》之類也；而和馬所作詩史更如唐杜甫(712-770)之作詩史。所傳作品有二：以利亞(The Iliad, 今譯伊里亞德)與阿陀賽亞(Odyssey, 今譯奧德賽), 文中清楚介紹兩部作品的卷數、內容、詩行及韻律, 並推崇和馬為「希臘詩人之祖」。此外, 亦介紹希臘全境文學之風最勝的雅典國, 包含雅典人自幼時起便習拳騎射, 以便身手; 同時從事於七種學問, 尤以「文章辭令」為精; 文中也簡論雅典三所書院之建築與授課; 希臘人喜藏書等面向。進而言及「希人開講肆於羅馬, 教之辭令, 羅人樂之」, 於是羅馬人也開始有作史及演故事者, 作詩名士有徽爾其留(Virgil, 今譯維吉爾, 70-19 B.C.), 詩作有愛乃揖斯(Aeneid, 今譯埃涅阿斯記); 另有「善為說辭者」, 曰基改羅(Marcus Tullius Cicero, 今譯西塞羅, 106-43 B.C.)。

由此, 艾約瑟所謂的「文學」至少包含兩個層面, 一是在「天人理數、文學彬彬」的對舉中, 以極可觀的篇幅介紹希臘、羅馬的文風鼎盛; 「文學」一途尤指史詩與古文辭, 不僅引介荷馬、維吉爾等人的史詩作品, 辯論家西塞羅的修辭術獲得標舉, 而且這是與中國詩史名家如唐代杜甫、明代楊慎的作品進行參照所帶出來的視野。此文的寫作年代甚早, 行文亦豐富可觀, 定義明確。雖說在1857年(清咸豐七年)真正能領略者有限, 然這片文字先後再由《申報》、《萬國公報》轉載, 相信為不同時期的中國士人提供了理解西國文學之重要線索。

此外, 「文學」的意涵亦包括廣義的「文明」、各類知識總合之意。文章後段提出「近人所作古希臘人物表」, 共列有辭令義理者、工文章能校定古書者等十五項學問。時間則是「自耶穌降生前一千二百年至二百年, 中國商末至楚漢之間」, 可知希臘文風之盛又不限於文章辭令, 更兼有經濟博物、天文算法、醫農水利、建築工藝等內涵。此文內容相信對長久以自我為中心, 自周王室起便確立華夷之辨的中

國人來說，不啻開啟了世界之眼，有機會識得西方文明之源。¹⁴

另在《萬國公報》的文學用例中，主要有〈大英文學武備論〉，該文介紹位於英國倫敦西北方的阿斯佛城一大書院（University of Oxford，今譯牛津大學）的設置概況，書院延請道德（Tutor）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先生掌教，「理君遊華多年，博覽羣書，嘗以學庸論孟詩書左傳譯為英文，現充書院講解華文大教習」，¹⁵ 文中並對書院組織及課程、課餘活動等作詳細介紹。此處「文學」與「武備」並舉，所指當為大學教育。¹⁶

至中日甲午戰敗，傳教士在報端開始出現各式興利除弊之議。1896 年由上海廣學會編譯出版了甲午戰爭的文獻資料集《中東戰紀本末》，尤其引起國人的廣泛重視，此書附有森有禮（Mori Arinori, 1847-1889）編，¹⁷ 傳教士林樂知與光緒進士任廷旭（?-?）合譯的《文學興國策》，¹⁸ 該書為森有禮出使美國期間，「特奉朝命，就近查訪美國文學成規，以為日本興學之先導」，¹⁹ 內容主要為美國教育制

¹⁴ [英] 艾約瑟，〈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六合叢談》第 1 號，頁 4-6。

¹⁵ 理雅各為英國倫敦傳道會宣教士，1853 年創刊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寶珍》，也開始翻譯中國經典。1862 年，中國學者王韜（1828-1897）流亡香港，開始襄助理雅各的翻譯。1861-1872 年間在香港出版者計有四書、《書經》、《竹書紀年》、《詩經》、《春秋》、《左傳》等書，至今仍是西方世界公認的標準譯本。理雅各於 1873 年返英後，主張研究儒家典籍，1876 年成為牛津大學的首任漢學教授。理氏生平與譯作可參閱 Lauren F. Pfister,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Assessing Confluences in Scottish Nonconformism, Chinese Missionary Scholarship, Victorian Sinology, and Chinese Protestantism*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¹⁶ 〈大英文學武備論〉，《萬國公報》第 10 年第 504 卷（1878 年 9 月 7 日），頁 43。

¹⁷ 森有禮為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生，學成歸國後，於 1870-1873 年間出使美國，返國後與福澤諭吉（1835-1901）等人創辦「明六社」，從事啟蒙運動。對於近代日本的政治與啟蒙教育皆有貢獻，為「日本現代教育之父」。詳甘慧杰，〈點校說明〉，收入 [日] 森有禮編，[美] 林樂知、任廷旭譯，《文學興國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1。

¹⁸ 甘慧杰，〈點校說明〉，頁 1-2。

¹⁹ [美] 林樂知，〈文學興國策序〉，《萬國公報》第 88 卷（1896 年 5 月），頁 5。

度資料匯編，日本透過此書借鑑美國教育既然有成，林樂知欲藉《文學興國策》以刺激中國教育之改良，可謂用心良苦。此書在當時亦有廣泛影響，如在《蒙學報》有葉瀚（1861-1936）所寫的〈文學初津〉，論及「文學初津」乃此報專欄，「專為幼童學習文法、易於通順而設」；²⁰ 林樂知在《中西教會報》第 6 卷第 63 期譯有〈俄國文學考略〉，探討基督教諸國之中，最不講求文學的俄國，其教育、學制等相關問題；²¹《選報》另有「文學小史」系列文章，內文分述「賢王興學」、「巨紳興學」與「編譯新書」、「識字新法」，²² 此時受到《文學興國策》出版的影響，這段期間出現的「文學」，所論基本上不出教育、學制等內涵。

由上文討論，傳教士對於「文學」一詞的使用，早期主要是在介紹希羅文學，或是泰西各國文物昌明，文風鼎盛的面貌，除了艾約瑟在〈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中所指稱的詩史文辭已近今日所謂「文學」內涵，更多的用例是指諸種學識之總和，以及教育、學制等內涵。

三、1902 年至 1911 年的「文學」觀念， 以晚清知識份子為中心

中日甲午戰後，除有傳教士發表各式興利除弊建言，中國知識階層也開始積極反省，參與國是，最具代表性的即是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策動十八省應試舉人參與「公車上書」活動，隨後由知識階層自辦報刊以啟蒙救國則日益勃興，此中尤以梁啟超所主導的維新報最具影響力，與「文學」觀念相關的重要論述也曾在報刊披佈

²⁰ 葉瀚，〈文學初津〉，《蒙學報》第 5 期（1897 年 12 月 24 日），頁 37。

²¹ 〔美〕林樂知譯，〈俄國文學考略〉，《中西教會報》第 6 卷第 63 期（1900 年 3 月 1 日），頁 10-11。

²² 〈文學小史〉，《選報》第 6 期（1901 年 12 月 31 日），頁 27-28。

流傳。透過數據庫的檢索所得，可將「文學」觀念的論述發展分為三類：其一，借鑑日本與歐西學者的文學史觀察，反思中國文學內涵，已帶出「文學」的現代意義者，代表人物有梁啟超、王國維（1877-1927）等人；其二，在新式學堂中，透過自編文學教科書，開始定義「文學」意涵，並梳理中國文學之發展者，代表人物有黃人、林傳甲等；其三，基於「發明國學，保存國粹」²³之宗旨，而欲使「文學」觀念重返中國傳統經史者，代表人物有劉師培（1884-1919）、章太炎（1869-1936，後易名為炳麟）等人。以下試分述之：

（一）借鑑日本與歐西學者的文學史觀察，反思中國文學史的發展

1. 以梁啟超為首的報刊議論

以梁啟超為首的報刊議論，主要出現在 1902 年由梁氏主編的《新民叢報》與《新小說》中。梁啟超一方面透過連載於《新民叢報》的「新民說」，有系統地建構「新民」觀，另一方面則論述小說與群治的關係，發起新小說革命。在《新民叢報》的宗旨即言明：「本報取《大學》新民之意，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中國所以不振，由於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採合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本原。」²⁴可知「新民」一詞雖源自《大學》，但在梁氏的擘劃下，已有鑄鑄中西道德以為德育之期待。另在新小說的提倡方面，傳教士早在《萬國公報》舉辦策論的徵文比賽，²⁵至 1895 年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

²³ 〈國粹學報略例〉，《國粹學報》第 1 年第 1 號（1905 年 2 月 23 日），收入王雲五主持，黃節等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 年），冊 1，頁 10。

²⁴ 〈本報告白〉，《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 年 2 月 8 日），頁 1。

²⁵ 《萬國公報》於 1889 年復刊時，為擴大影響力，除贈閱給參與科考士人，也多次舉辦有獎徵文活動，以吸引士人參與。如 1894 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出題 5 道，在直隸等五省徵文，題目為：一、振興中國論；二、維持絲茶議；三、江海新關考；四、禁

提出〈求著時新小說啓〉，主張「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因此公開徵求描述鴉片、時文或纏足之害的「時新小說」，同時規範「辭句以淺明為要，語意以趣雅為宗」，「述事務取近今易有，切莫抄襲舊套，立意毋尚希奇古怪」，²⁶顯然已為「時新小說」的寫作題材與手法訂定方略，雖說參賽作品多數不符傅蘭雅對於小說體格的期待，²⁷但這批作品嘗試以小說參與時政，批評時弊，堪稱清末政治小說、譴責小說寫作的先聲。²⁸等到1898年戊戌變法失敗，梁氏流亡日本，再受明治維新啟發，先有倡議譯印政治小說之舉，再續辦《新小說》雜誌以鼓勵新小說的創作。在《新小說》廣告中便聲明「本報宗旨，專在借小說家言，以發起國民政治思想，激厲其愛國精神。」²⁹另在〈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中，梁氏也強調「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欲新宗教、欲新政治、欲新風俗、欲新學藝、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³⁰可知1902年梁氏所辦兩份刊物，看似分屬政治、文藝兩端，實則有欲新吾國，當新吾民；而欲新吾民，當新吾小說之次第邏輯，可見梁氏看重小說的藝術感染力，將「小說」當作新民新政的改良工具。因此在這兩份雜誌中出現的「文學」用例，基本上也環繞在此核心關懷中。

煙檄；五、中西敦睦策。此次共收到172篇論文，評出70名，分為六等，康有為便曾參與並獲六等獎。詳陳玉申，《晚清報業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頁29-30。

²⁶ [英]傅蘭雅，〈求著時新小說啓〉，《萬國公報》第77卷（1895年6月），頁13。

²⁷ [英]傅蘭雅，〈時新小說出案〉，《萬國公報》第86卷（1896年3月），頁30-31。

²⁸ 相關討論可參見[美]韓南（Patrick Hanan）著，徐俠譯，〈新小說前的新小說——傅蘭雅的小說競賽〉，《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47-168；黎子鵬編注，〈導論〉，《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新北：橄欖版公司，2015年），頁xv-xlvi。

²⁹ 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14號（1902年8月18日）。

³⁰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年第1號（1902年11月14日），頁1。

(1)《新民叢報》

在《新民叢報》中，「文學」的用例既有表現出狹義的文學觀，同時又有狹廣兩義併陳者。

在梁啟超〈飲冰室詩話〉裡言及：「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於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³¹ 下文則對譚嗣同（1865-1898，又名瀏陽）、黃遵憲（1848-1905）、嚴復（1854-1921）、康同璧（1887-1969）、與狄葆賢（1872-1941，號楚卿、平子）筆記所錄奇女子的詩詞逐一品評，可知梁氏所指的「文學」是詩文辭。

另在奮翻生（1882-1916，蔡鍔，梁的學生）〈軍國民篇〉中，作者為拯救甲午戰後中國之「國力孱弱，生氣銷沈」，特別倡議「軍國民主義」以救亡。所謂軍國民主義者「昔濫觴于希臘之斯巴達，汪洋于近世諸大強國」，在日本則兒童走卒莫不以「大和魂」自矜，即日本尚武精神之謂也。反觀支那民族之性情習慣則「尚文好利」，乏道德心，使「漢族之墮落腐壞不堪以致於此極者」，實有八點無形之原因所致耳。³² 其中有「文學」一項，論者舉出中國傳統詩文如〈出師表〉、〈哀江南〉、或岳武穆（1103-1142，岳飛）文、文山（1236-1283，文天祥）等傳，固能激起讀者忠義之心與慷慨之感，但中國詞人莫不摹寫從軍之苦與戰爭之慘，從未有謂從軍樂者，而這類描寫戰爭悲苦的詩歌將使讀者「垂首喪氣，黯然銷魂」，想要求得所謂「不斬樓蘭終不還」之句，反而不可多得，因此國民之氣遂至餒潰。而文學中最具感化力者莫如小說，然中國之小說非才子佳人，即是狐妖鬼神、離

³¹ 飲冰子（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第4號（1902年3月），頁99。

³² 奮翻生（蔡鍔），〈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頁79-88。另，此八點為教育、學派、文學、風俗、體魄、武器、鄭聲、國勢。詳奮翻生，〈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1號，頁83-88；第3號（1902年3月10日），頁65-72；第7號（1902年5月8日），頁67-69。

奇怪誕或淫褻鄙俚之作，使得中上以下之社會，莫不為其「魔力」所「攝引」，導致「中國廉恥之所以掃地，而聰明才力所以不能進步也。」³³ 可見奮翻生認為傳統「文學」實是導致中國積弱之原因，是從批評積弊的角度來證成其師梁公欲新國新民，必新小說的意見。如此，此篇「文學」所指則是詩文傳記與小說，顯見是狹義文學的範疇。

另有章太炎的〈文學說例〉先在《新民叢報》第 5、9、15 期連載，³⁴ 後擴增為《噓書》重訂本中的〈訂文第二十五〉的〈附：正名雜義〉。³⁵ 按章氏於 1902 年逃亡日本時，曾寓新民叢報社，對於《新民叢報》頗為讚賞，當時章氏除為廣智書局刪潤譯稿，也間作文字登《新民叢報》中，以供旅費，³⁶ 故該文可放在此脈絡下解讀。

在〈文學說例〉中，章氏一方面以最廣義的「語言文字之學」來定義「文學」，所謂「文學之始，蓋權輿于言語，自書契既作，遞有接構，則二者殊流，尚矣。」³⁷ 另一方面，在談論「希臘文學」時，則參閱了〔日〕澁江保（1857-1930）所著《希臘羅馬文學史》來說明文類發展的規律，以及韻、散文類的區分與內涵，文曰：

希臘文學，自然發達，觀其秩序，如一歲氣候。梅花先發，次及櫻花；桃實先熟，次及柿實。故韻文完具而後有散文，史詩功善而後有戲曲。韻文先史詩，次樂詩，後戲曲；散文先歷史哲學，後演說。其所謂史詩者，一大史詩，敘述複襍大事者也；

³³ 奮翻生，〈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 1 號，頁 86-87。

³⁴ 章氏學（章太炎），〈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 5 號（1902 年 4 月 8 日），頁 75-80；第 9 號（1902 年 6 月 6 日），頁 65-70；第 15 號（1902 年 9 月 2 日），頁 49-60。

³⁵ 《噓書》是章太炎的第一部自選集，先後有三種集結本，即《噓書》初刻本（1900）、《噓書》重訂本（1904、1906）、《檢論》（1914）。關於《噓書》三種版本的考辨，可參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前言〉，《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冊 3，頁 1-22。

³⁶ 知拙夫（章太炎），〈致吳君遂等書四〉，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3 年），冊上，卷 2，頁 75-76。

³⁷ 章氏學，〈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 5 號，頁 75。

二禪詩，叙述小說者也；三物語；四歌曲，短篇簡單者也；五正史詩，即有韻歷史也；六半樂詩，樂詩史詩混合者也；七牧歌；八散文作話，毗于街談巷語者也。³⁸

在這段文字中，章氏將希臘文學的發展比擬做自然花序的依次開放，隱然帶出文學發展也有其定律，主要分為韻文與散文兩大類：韻文由史詩發展而為樂詩、戲曲；散文則由歷史哲學發展而為演說。此外，也針對「史詩」進行八大類別的區分。整體觀之，此中已包含了詩歌、小說、戲曲、散文等文類，實已符合今日狹義的「文學」內涵。

在說明希臘文學發展之後，進而考察中國文學之發展，有所謂「徵之禹域，秩序亦同，夫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文質不同，繁簡亦異。」文中先觀察由商周誓誥到帝典³⁹的發展，已見文章是從語體慢慢朝向韻文發展，再從「帝典」既具備「有韻之史」的特色，同時也有「文句參差，恣其修短，與詩殊流」的特質，從此韻散分流日趨明顯，韻文由帝典而發展為史詩、二雅、辭賦等；散文則從帝典發展為春秋、哲學演說。文中特別說明「春秋以降，史皆不韻，而哲學演說，亦由斯作。」一方面，《春秋》以降的史書皆不用韻，即史書大體上是以散文形式書寫；另一方面，則藉由探討諸子的體式，歸納出管子（725-645 B.C.）、老子（約 570-約 470 B.C.）遵循舊章遺則；孔子（551-479 B.C.）、墨子（約 470-約 391 B.C.）二家，則「自我作故，既非敘數，亦不用韻，六國諸子，皆承其風烈矣，斯哲學所由昉乎」；另有縱橫家、名家，雖說「縱橫近於雄辯」，而「名家契于論理」，但兩者皆隸屬於「演說」。由此分梳，則所謂的三科之條：詩賦、史書、哲學，實已暗合今日的文史哲分科。

此外，文後又提及「言語文學，厥科本異，凡纂錄文辭者，宜無

³⁸ 章氏學，〈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 15 號，頁 49。

³⁹ 帝典指《尚書》中的〈堯典〉、〈舜典〉篇。

取焉。」⁴⁰ 據《尙書》重訂本中的夾注說明，「戰國陳說，與宋人語錄、近世演說為類，本言語、非文學也。……故宜溝分畛域，無使兩傷。文辭則務合體要，口說則在動聽聞，庶幾各就部伍爾。」⁴¹ 可知章太炎又將「言語」、「文學」進行區分，「言語」指口頭語，在本文中尤指縱橫家、名家之流所隸屬的演說之類；而「文學」則相對於口說，是務合體要之文辭，在本文中指詩賦、史書、哲學之體。

由上文討論，章太炎在〈文學說例〉中對於「文學」一詞的使用，一方面是最為廣義的語言文字之學，二方面則已藉由澁江保的文學史視野而展現出狹義的文學意涵，並嘗試依此邏輯，借鑑思辯中國文學發展，基本上已得出文史哲的分科，以及語體、文體之別。

(2)《新小說》

自從梁啟超在《新小說》創刊號寫下〈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已將中國歷來視小說為小道的觀點，轉化為「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文類價值觀。除了梁氏本人提倡，相關論點尤能在維新派同人間或相關報刊上看到引述發揮，翕然景從，最終成功推動了「小說界革命」。⁴² 以「文學」用例觀之，如楚卿在〈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中提到，除梁文所謂的「二種德四種力，足以支配人道左右羣治者」，在簡繁、古今、蓄洩、雅俗、實虛等相對的性質中，良小說比起其他文類，更擅長於縱橫繁衍、專注現在、發洩無遺、有助於言文一致、熔冶虛實於一爐也，故而「東西各國之論文學家者，必以小說家居第一」，「取天下古今種種文體而中分之，小說占其位置之一半」。⁴³ 此外，在東京創刊的《湖北學生界》也刊登有〈論支那文學與羣治之關

⁴⁰ 章氏學，〈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15號，頁49-50。

⁴¹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訂文第二十五 附：正名雜義〉，《尙書（重訂本）》，《章太炎全集》，冊3，頁227。

⁴²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頁3。

⁴³ 楚卿（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6日），頁1-2。

係)，不僅在題名上直接呼應了梁文，並將「小說」擴充為「文學」，認為過去導致支那「亡國滅種之媒」與未來「起死回生之劑」者皆是「文學」，因此「欲革新各種社會必革新各種文學」！但文中所謂「文學」，乃泛指孔子、孟子（372-289 B.C.）、周公（?-?）、漢祖（256或247-195 B.C.）、韓非（281-233 B.C.）、管仲、商鞅（390-338 B.C.）、史遷（145-約86 B.C.）、孫子（544-470或496 B.C.）、老子、莊子（約369-286 B.C.）、屈原（約343-約278 B.C.）等人之說，文稱支那之宗教家、主權者、法律家、經濟家、軍人、歷史家、哲學家、愛國鉅子皆文學家也，⁴⁴ 顯然又將「文學」二字擴大成最廣義的學問。

《新小說》自第7號起開始刊載「小說叢話」專欄，據飲冰的前言指出，「談話體之文學」在中國已有二三百年的歷史，不僅詩話、文話、詞話有之，即最乾燥之考據學、金石學「往往用此體出之，趣味轉增」，唯小說尚闕如也，因此在評閱《桃花扇》所寫下的筆記十餘條基礎上，再加上與平子、麥孟華（1875-1915，號蛻庵）、麥仲華（1876-1956，一名璣齋）、林奎（?-?，一名慧廣）、均歷（?-?，本名不詳）、（蘇）曼殊（1884-1918）集會時，眾人縱論小說之微言大義，後透過「小說叢話」次第刊之。⁴⁵ 在此專欄中，飲冰與維新派諸生⁴⁶ 也曾探討「文學」觀念，舉其要者有以下諸端：

其一，站在各國文學史的視角來檢視中國文學之發展。如飲冰談及「文學之進化有一大關鍵，即由古語之文學變為俗語之文學是也。各國文學史之開展，靡不循此軌道。」可惜「尋常論者多謂宋元以降為中國文學退化時代」，飲冰則以為「自宋以後實為祖國文學之大進

⁴⁴ 〈論支那文學與羣治之關係〉，《湖北學生界》第5期（1903年5月），頁75-78。

⁴⁵ 飲冰（梁啟超）等，〈小說叢話〉，《新小說》第7號（1903年9月6日），頁165。「小說叢話」在1902-1905年間刊登於《新小說》的第7至9號、11至13號、15至17號及19號。

⁴⁶ 狄楚卿為維新派人士，麥孟華、林奎則為康有為的學生。蘇曼殊在就讀橫濱大同學校期間，曾獲梁啟超選入夜間中文特別班深造。詳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蘇玄瑛」條，頁171。

化」，主要原因乃「俗語文學大發達。故宋後俗語文學有兩大派，其一則儒家禪家之語錄，其二則小說也。小說者決非以古語之文體而能工者也。」可惜清朝考據學盛，反使俗體文學生一頓挫，小說得不到重視。在此論中，飲冰一反前說，將宋元以降出現的俗語文學視為文學之大進化，而非退化現象；並且再度標舉小說之價值。對此問題，慧廣則提出「各國文學史，皆以小說占一大部分，且其發達甚早。」中國之所以不發達者，乃「吾國之思潮本分南北兩大宗，而秦漢以後，北宗殆占全勝，北宗者主嚴正實行者也，北宗勝而小說見蔑棄亦宜。」⁴⁷ 關於語體的進化論、重視俗文學的發展，並將中國思潮分南北兩宗的看法，⁴⁸ 主要來自日本明治漢學家所撰著的文學史論述，從藤田豐八（1869-1929）所著的《支那文學史》、《支那文學史稿 先秦文學》，便可見作者運用當時最為流行的〔法〕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種族、環境、時代」（race, surroundings, epoch）學說，採取「思想內容」如何影響「藝術形式」的方法論，再加上「北方」、「南方」的地域性、人種之別，逐一建立起「地勢→國民性→思想→文學」的文學史立論模式，此論在當時的漢學與東洋學界中，可說是影響最廣、最有力的論點。⁴⁹ 隨後在笹川種郎《支那小說戲曲小史》、《支那文學史》等著作中，都可看到此論述模式續作發揮，尤其笹川氏的《支那文學史》曾於 1903 年以《普通百科全書》的中譯形

⁴⁷ 飲冰等，〈小說叢話〉，頁 166-167。

⁴⁸ 中國境內自唐以降即出現各種南北分宗之論，如唐時同在弘忍（601-674）門下受業的惠能（638-713）與神秀（606-706）因對禪的見解不同，遂使禪家分為南北二宗。至明人魏良輔（1489-1566）、康海（1475-1540）、王世貞（1526-1590）亦留意到南戲、傳奇之興，與北方雜劇不同，於是提出南北之別。近代王國維也有「北劇南戲」的觀察。上述南北分宗固有以地理分出詞風者，但也有因理念、風格、形制不同而做出南北之分，不一定與人種或地域風土產生必要關連。此處慧廣之議論，不僅將南北兩宗思潮上溯至秦漢，並有北宗勝南宗的說法，實借鑑當時流行於日本漢學界的文學史論述。詳〔日〕藤田豐八，〈序論〉，《支那文學史稿 先秦文學》（東京：東華堂，1897年），頁 1-12。

⁴⁹ 〔日〕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年），資料篇，頁 37-41。

式，⁵⁰ 在上海會文學社出版，總說即論及「南北兩人種之差異」，所謂「南方之人種自為想像的，北方之人種自為實際的」，「如斯儒教所出之北方人種文學，為實用的文學。……然如理想界產物之小說戲曲，至元朝始開其端」⁵¹ 云云，此一立論模式同樣影響著中國知識份子早期的文學史觀，稍晚我們會見到王國維、黃人等人關於此論題的傳承與思考。

其次，對於俗文學的看重，主要表現在小說與戲曲之上。在小說方面，「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的說法已如前揭，在「小說叢話」專欄中，慧广也提出「各國文學史，皆以小說占一大部分，且其發達甚早」；平子則肯定「小說之效力必不僅及於婦女與粗人」，「若英之索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今譯莎士比亞，1564-1616〕，法之福祿特爾〔Voltaire，今譯伏爾太，1694-1778〕以及俄羅斯虛無黨諸前輩，其小說所收之結果，仍以上流社會為多，西人謂文學、美術兩者能導國民之品格之理想，使日遷於高尚。穗卿〔1863-1924，夏曾佑〕所謂看畫、看小說最樂，正合此理，此當指一般社會而言者也。夫欲導國民於高尚，則其小說不可以不高尚。」⁵² 可見論者以英法俄諸國的文學家作為參照，肯定佔文學半數的小說，實具有引領國民品格趨於高尚之功能。

此外，梁啟超與友朋決議以「談話體之文學」來綜論小說，便是基於梁氏閱讀《桃花扇》所得之觸發，可見當時梁氏對於小說、戲曲之別還不甚嚴謹。⁵³ 當他以比較視野嘗試觀察中西詩歌表現時，難免

⁵⁰ 據陳玉堂稱，笹川種郎書有以《歷朝文學史》為名，為上海中西書局翻譯生譯，於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十（1904年1月26日）發行者。因筆者未見，暫列於此，以待來日查考。詳陳玉堂編，《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書社，1986年），頁125。

⁵¹ 詳〔日〕笹川種郎原著，范迪吉總譯述，《普通百科全書》（上海：上海會文學社，1903年），全書之六十九，頁1-3。

⁵² 飲冰等，〈小說叢話〉，頁167-168。

⁵³ 關於梁啟超的文類觀，可參夏曉虹，〈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收入夏曉虹等著，陳平原主

產生以西律中，從字數多寡探討中西差異與優劣，所謂「泰西詩家之詩，一詩動輒數萬言，若前代之荷馬、但丁〔Dante Alighieri, 1265-1321〕，近世之擺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彌兒頓〔John Milton, 1608-1674〕，其最著名之作，率皆累數百葉始成一章者也。」相較而言，「中國之詩，最長者如『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之類，罕過二三千言外者」，⁵⁴ 若以數字計，則東方文家才力似乎稍顯薄弱。在民族自信心的驅使下，梁氏再從文體翻譯的角度，對中國詩進行詮解，文曰：

詩何以有狹義有廣義？彼西人之詩不一體，吾儕譯其名詞，則皆曰詩而已，若吾中國之騷、之樂府、之詞、之曲皆詩屬也，而尋常不名曰詩，於是乎詩之技乃有所限。吾以為若取最狹義，則惟三百篇可謂之詩；若取其最廣義，則凡詞曲之類皆應謂之詩數。詩才而至詞曲，則古代之屈〔原〕、宋〔玉〕，豈讓荷馬、但丁，而近世大名鼎鼎之數家若湯臨川〔顯祖〕、孔東塘〔尚任〕、蔣藏園〔世銓〕其人者，何嘗不一詩累數萬言耶，其才力又豈在擺倫、彌兒頓下耶。⁵⁵

可知梁啟超透過西方詩體特徵（主要為史詩、敘事詩），為中國詩歌之發展描繪出狹義與廣義之詩——即韻文的發展；加上進化論的觀察，詩界從三百篇到詞曲之發展，不僅有語言從四言、五言而七言、長短句漸趨複雜，曲本之體式也發展出四項長處：使「唱歌與科白相間」、曲本所描寫「主伴可多至十數人或數十人，各盡其情」、每詩可發展為數十折，每折又可有數十調之發展，長短自由、曲本又可任意

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57-186。

⁵⁴ 飲冰等，〈小說叢話〉，頁170。

⁵⁵ 飲冰等，〈小說叢話〉，頁170-171。

綴合諸調別為新調，因此梁氏以「曲本為巨擘」，從中又標舉《桃花扇》，以其「結構之精嚴，文藻之壯麗，寄託之遙深」而「冠絕前古矣」。⁵⁶ 在此論證中，任公藉由與泰西詩家比較，進化論史觀之套用，不僅使中國傳統戲曲的優點得到闡揚，戲曲、小說等俗文學也逐漸成為士人關注的重要文類。

2. 王國維：〈文學小言〉、〈屈子文學之精神〉（1907）

王國維在十八歲前主要接受傳統教育，之後因甲午戰敗而留意新學，其為學途徑也有了轉變。庚子亂後，王氏於羅振玉（1866-1940）創辦的《教育世界》擔任主編，該刊不僅移譯東西教育規制學說，亦將王氏當時熱衷的心理、物理、哲學諸說的日文論著譯介於此。1907年曾在此刊先後發表〈文學小言〉與〈屈子文學之精神〉兩文，約可代表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與《人間詞話甲稿》後，所提出的文學觀點。

在〈文學小言〉中，王氏以傳統詩話、詞話的形式寫下關於「文學」的看法，共計十七條，此中對於「文學」之討論已受西方思潮影響，頗能跳脫傳統窠臼，而進行文學批評式的觀察，因此十分值得注意。其內容可歸納為以下幾種：一、反對功利之文學，藉此也區分出哲學、文學與科學之不同。有所謂「余謂一切學問皆能以利祿勸，獨哲學與文學不然，何則？科學之事業，皆直接間接以厚生利用為旨，故未有與政治及社會上之興味相刺謬者也。」並進一步指出「文繡的文學」、「鋪綴的文學」、「模倣之文學」皆不足為真文學；二、談論文學的本質：所謂的文學除有遊戲的性質，還有景與情二原質，「前者以描寫自然及人生之事實為主，後者則吾人對這種事實之精神的態度也」，故而客觀與主觀兼具，知識與感情併陳，「要之文學者不外知識

⁵⁶ 飲冰等，〈小說叢話〉，頁 171-173。

與感情交代之結果而已。」此外，情與言相繫，言離情則不真；三、唯有高尚的人格才能造就偉大的文學。因此有文學之天才者，又需莫大之修養也，一如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不可不歷三種階段；又言「苟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也。」天才者「又須濟之以學問，帥之以德行，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四、文學又可分為抒情的文學，如離騷、詩詞皆是；敘事的文學，如敘事傳、史詩、戲曲等，非謂散文也。「元人雜劇辭則美矣，然不知描寫人格為何事，至國朝之《桃花扇》則有人格矣。」在此論中，王國維以人格之有無來衡量文學之高下，因此《桃花扇》得到標舉，相較於梁啟超以進化論的觀點，肯定《桃花扇》不僅是文類發展漸臻完備的曲本，其內容也讓人感受故國之感、民族主義之思想，在結構、文藻、寄託各方面皆有發揮，⁵⁷ 兩人角度雖不同，但肯定《桃花扇》之價值則相同；五、論及文學的作用。王國維以為好的戲曲小說如《三國演義》敘關羽（160-220）義釋曹操（155-220）、《水滸傳》寫魯智深、《桃花扇》寫柳敬亭（1587-1670）、蘇崑生（1600-1679）等，皆「以其不顧一己之利害」，可「使吾人生無限之興味，發無限之尊敬」，正如汗德（Kant, 1724-1804）所云「實踐理性為宇宙人生之根本歟。」可見王氏已嘗試匯通中西文學、哲學之思想；六、論及文學之專門與職業之不同。王國維以為「吾人謂戲曲小說家為專門之詩人，非謂其以文學為職業也。以文學為職業，舖綴的文學也。職業的文學家，以文學得生活；專門之文學家，為文學而生活。」⁵⁸ 再次肯定專門文學家的重要。

另在〈屈子文學之精神〉一文中，王國維先將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分為二派，即帝王派／非帝王派，近古學派／遠古學派，貴

⁵⁷ 王國維，〈文學小言〉，《教育世界》第139期（1906年），頁1-4、6。梁啟超的觀點，見飲冰等，〈小說叢話〉，頁173-175。

⁵⁸ 王國維，〈文學小言〉，頁6-7。

族派／平民派，入世派／遯世派，熱性派／冷性派，國家派／箇人派，前者大成於孔子、墨子，後者大成於老子，在一系列的二元對立內涵後，最後歸結為地域上的北方派／南方派，此兩派之主義常相反對而不能相調和。有此思想分派之基礎，中國之文學亦發展出南北二派，「然南方學派則僅有散文的文學，如老子莊列是已，至詩歌的文學則為北方學派之所專，有詩三百篇大抵表北方學派之思想者也。」此文尤其論證「大詩歌之出，必須俟北方人之感情與南方人之想像合而為一，即必通南北之驛騎而後可，斯即屈子其人也。」⁵⁹ 如前所論，將中國文學進行南北分宗的論述主要源於日本明治漢學家藤田豐八，而藤田氏自 1898 年起便與王國維有師生之誼，王氏既長期親炙藤田氏，⁶⁰ 關於南北分宗的觀點乃師從藤田氏之說自不待言。

3. 其他論述

在梁、王的論述外，這段期間還有一些散見的文章，亦透過西方文學概念之譯介與參照，而展現現代文學意義者。如在 1903 年於《大陸報》刊登的〈論文學與科學不可偏廢〉就十分值得注意。

此文以「文學」與「科學」對舉的方式，簡述各自的原文、音譯、意義與流傳發展，文曰：

文學者何？所謂形上之學也。科學者何？所謂形下之學也。科

⁵⁹ 王國維，〈屈子文學之精神〉，《教育世界》第 140 期（1906 年），頁 1、4。

⁶⁰ 自 1897 年起，藤田豐八便前來中國參與羅振玉所辦的《農學報》翻譯工作；1898 年藤田氏與羅振玉共創東文學社於上海，以日文教授科學，並翻譯日本新刊書籍，當時王國維便是東文學社的學生，與藤田氏在上海已有師生之誼。至 1901 年王國維主編《教育世界》期間，亦得到藤田氏諸多建言；1902 年王國維因藤田氏介紹而入東京物理學校肄業，返國後仍從藤田氏學習英文不輟；1904 年底兩人先後前往江蘇師範學院執教，王氏暇時仍從藤田氏問學。關於藤田氏與羅、王之交往可參閱〔日〕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資料篇，頁 38-39；袁英光、劉寅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年），頁 10-46。

學二字，為吾國向所未有，蓋譯自英文之沙恩斯。Science 英文之沙恩斯，又出于拉丁之沙倭。Scio 沙倭云者，知之謂也。至十六世紀，沙恩斯一字，乃與阿爾德 Art 一字相對峙，蓋沙恩斯為學，而阿爾德則術也。至十七世紀，沙恩斯一字，又與律德來久 Literature 一字相對峙，蓋沙恩斯為科學，而律德來久則文學也。茲義實傳至今日，傳至東方，傳至我國。此科學二字所由來也。⁶¹

在這段說明裡，事實上已蘊含著兩個層次的訊息。首先，是關於「科學」內涵的變化，在現代科學發展之前，科學問題是被當成形上學的一部份，稱為「自然哲學」，而「Science」所指主要為「知識」（Knowledge）的內涵。至十七世紀以後，「Science」的字意產生變化，慢慢有了理論知識的內涵，而與強調技藝的學問「Art」分立。此外，隨著科學的逐步發展，十七世紀以降，源於實驗的「實驗科學」（experiment science）也逐漸與「哲學」分道揚鑣，使得「哲學」成為討論「形上之學」的學問，而「（實驗）科學」則成為「對自然作有方法的理論研究」。⁶² 其次，「文學」作為「Literature」的對譯詞，音譯為「律德來久」，自十七世紀以來乃是一門與「科學」相對峙的學問，主要研究「形上之學」。

我們若進一步探求「文學」的內涵，在論及希臘文學時，其文曰：

以今日之學言之，則歐美實世界之母也；以古時之學言之，則希臘又歐美之母也。蓋論其文學，則蘇格拉第〔Socrates，今譯蘇格拉底〕、柏拉圖〔Plato〕、亞歷斯度德爾〔Aristotle，今譯

⁶¹ 〈論文學與科學不可偏廢〉，《大陸報》第3期（1903年1月），頁1。

⁶² 關於「Science（科學）」的演變可參閱〔英〕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Science（科學）」條，頁346-350。

亞里斯多德]之哲學，荷墨〔Homer，今譯荷馬〕之詩歌，翁洛道泰〔Herodotus，今譯希羅多德〕之史學，伊斯吉勒〔Aeschylus，今譯伊思奇勒斯〕、蘇福格利〔Sophocles，今譯沙弗克力斯〕之傳奇，他國之文學莫與匹也。……故今日歐洲各國，文學盛而科學尤盛，即科學盛而文學益精，兩者互相調和，互相發明，僉不曰希臘之賜。⁶³

上文所舉「文學」實例，實已包含哲學、史詩、史學及希臘悲劇，而且所舉皆為重要代表作家，已能說明歐西以哲學、史學、文學為主要範疇的人文之學。

而在參照古代中國文學時，則又透露了不同的訊息，其文曰：

至若以我國言之，……其科學發達之早，固不待言，然今則僅有文學，固無所謂科學也。且即以文學言之，漢魏不如周秦，元明不如唐宋，降及今日，僅餘科舉之文、公牘之文、并彈詞小說之文，則支那雖曰僅有文學，實并無所謂文學也。⁶⁴

此論不僅帶出了退化的文學史觀（漢魏不如周秦，元明不如唐宋），論及當今（晚清）的文學時，也認為僅剩應試、公牘之文，以及彈詞小說之文，若就作者強調中國「雖有」而「實無」文學的姿態看來，這裡的「彈詞小說之文」顯然並未受到重視。

等到歐亞交通，黃白相見之際，先輸入西國之科學，繼之以文學，終使支那文學科學產生了大革命。然而支那士夫面對西學的姿態，則由老大帝國的自尊自大，慢慢走向天下病夫的盲瞽自卑，「其始以為天下之學，盡在中國，而他國非其論也。其繼以為我得形上之學，彼得形下之學，而優劣非其比也。其後知己國即無文學，更無科學。然

⁶³ 〈論文學與科學不可偏廢〉，頁2。

⁶⁴ 〈論文學與科學不可偏廢〉，頁2-3。

即畏其科學之難，而欲就其文學之易，而不知文學科學，固無所謂難易也。」因此論者再三強調，「夫文學與科學，固互相為用者也。未有舍科學而言文學者也。」⁶⁵ 可見論者清楚標舉「文學」與「科學」彼此區別，又互相為用的特性，此文尤其清楚標注兩詞的原文與流行變化，可說是在晚清報刊中清楚表述現代「文學」觀念的重要例證。

由以上討論，晚清知識份子藉由借鑑日本與歐西的文學相關論述，不僅透過參照的視野揭舉小說、戲曲等俗文學的重要性，也在嘗試運用進化論、退化論、南北分宗、或是西方哲學的觀點來建構中國文學現代化的探討模式，對於「文學」觀念的現代化發展，自有其開拓性意義。

（二）國人自編文學教科書，開始定義「文學」，梳理文學發展

除了梁啟超、王國維等人援引日本與歐西學者著述作為參照系統，開始對中國文學的優劣進行析論，數據庫的「文學」用例顯示另有一批知識階層，則在新式大學中，透過講授文學史而嘗試編撰文學講義，進行梳理文學發展者，代表者有黃人與林傳甲。「新式學校」本就是張灝所謂「制度性傳播媒介」之一，是「新知識、新思想的溫牀與集散中心」，⁶⁶ 藉由新型知識份子於新式大學講授「文學史」並編撰文學講義，相信會使「文學」的定義、文學史觀如何建立等議題透過講堂上的師生互動，再經校刊雜誌連載發佈，而使新知識的生產得到進一步的傳播與推廣。

1. 黃人：〈國文學贅說〉（1906）；〈文學史上〉（1907）

1901 年黃人接受清末東吳大學校長孫樂文（David Laurence

⁶⁵ 〈論文學與科學不可偏廢〉，頁 3。

⁶⁶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頁 39。

Anderson, 1850-1911) 聘請，擔任漢文教習，並於 1904 年起開始編授國學教材——《中國文學史》，過程中亦曾透過《東吳月報》、《東吳大學堂學桴》等校刊刊載〈國文學贅說〉，⁶⁷ 以及「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等部分內容，標題為「文學史上 分論 華離期及曖昧期 橫決力及反動力」，⁶⁸ 至 1907 年已完成《中國文學史》講義，文分總論、略論、分論，「以下亦門分派別，結構謹嚴，惟發抄各家程式文時，致涉繁泛。書雖出版，不合校課之用」，⁶⁹ 事後黃人亦思修改重印，但 1913 年 9 月黃人因病過世，直至 1926 年，才由友人王文濡（1867-1935，字均卿）（任中華書局編輯）負起「修改之責」，「完成合式之本，付諸鉛印」。今日所見黃人《中國文學史》係由上海國學扶輪社於 1911 年左右出版，共 30 冊（其中一冊為手抄本），現藏於蘇州大學圖書館，為「清末東吳大學以鉛字油光印行」的本子，而非後來王文濡所修改的「合式之本」。⁷⁰

在〈國文學贅說〉一文中，黃人先做「國文學」定義，主要以天演界的公例來說明文學之發展，並將「文學」分為廣狹二意，以廣義言，「則事物之有藻采者，概得謂之文（美學一部準中國舊義皆可曰文學），僅屬之六藝猶偶見焉。以狹義言，則或以有韻者為文，或以駢儷者為文，甚者以不填故實而字句修短錯落者為古文，而別其餘為俗文（古文實因對於科舉之文而言，猶因草訂揣摩本而別其餘為綫訂

⁶⁷ 黃人，〈國文學贅說〉，《東吳月報》第 6 期（1906 年 11 月），頁 1-7；第 8 期（1907 年 1 月），頁 1-4。

⁶⁸ 黃人，〈文學史上 節錄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東吳月報》第 11 期（1907 年 6 月），頁 1-8；第 12 期（1907 年 7 月），頁 1-8；另見黃人，〈文學史上〉，《東吳大學堂學桴》第 2 年第 1 期（1907 年 11-12 月），頁 15-20。

⁶⁹ 此為黃人東吳大學的同事徐允修（?-?）在《東吳六志·志瑣言》中關於該校中文教習編纂國學課本的描述。轉引自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 年），頁 206。

⁷⁰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頁 204-208。

書也)。」可知黃氏以有藻采者之美文為廣義文學，以韻文、駢儷文或修短的古文為狹義的文學。然而，「文學之名迄無定準」，黃人有感於「近者歐美學風浸被禹甸，教育者新舊學兼施，而舊學既非一種，沿故名又不當於科目」，遂統稱之為「國文學」，「斟酌廣狹之間，此義似較明確」，尤其考慮到「吾國學子不論覽何種書，治何等學，其感情上大率以文學之優劣為軒輊，而著書立說者，亦斷斷於此，則雖謂中國一切學皆文學可也。」⁷¹ 由此論辯可知，黃人是在考量新舊學科之區別，故擬出「國文學」來統稱中國一切之舊學問，又因不論覽書治學或著書立說，概以「文學」之優劣為判準，故稱「中國一切學皆文學可也」，又將「文學」放在最廣義的定義。

在「國文學」的命名上，我們也可在明治時期東京帝國大學的分科調整與命名經驗中，看到「和漢文學科」如何從和、漢合一，慢慢透過語文差異區分為「和文學科」、「漢文學科」，再以民族國家觀念析出「國文學科」與「漢學科」。⁷² 「國文學科」的提出標誌著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國家的興起與文學觀念的結合，使得國族文學、國別文學的觀念得以日益清晰，在中日文學觀念的發展進程中皆可見到實例。而黃人此時對於「文學」的認知，與日後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定義相互參照，尤可見得黃人識見之不斷提升。在《普通百科新大辭典》的「文學」條中，黃人不僅點出中外「文學」定義之差別，在列出「歐美各國文學界說」時，亦區分廣狹之別，文稱：「以廣義言，則能以言語表出思想感情者，皆為文學。然注重在動讀者之感情，必當

⁷¹ 黃人，〈國文學贅說〉，《東吳月報》第6期，頁2-3。

⁷² 明治十年（1877）東京大學成立，由法學部、理學部、文學部和醫學部構成，在文學部中設有和漢文學科。至明治十八年（1885），漢文學科分離為和文學科與漢文學科。至明治十九年（1886），據〈帝國大學令〉，東京大學成為帝國大學，東京大學文學部也改為帝國大學文科大学，其下設有哲学科、和文学科、博言学科、漢文学科。至明治二十二年（1889），再增設國史科，並將和文学科與漢文学科分別改名為國文学科與漢文学科。詳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頁89-91。

使尋常皆可會解，是名純文學。而欲動人感情，其文詞不可不美。故文學雖與人之知意上皆有關係，而大端在美，所以美文學亦為美術之一。」⁷³ 可見黃人在詞藻美的認知基礎上，又添加了思想感情的因素，讓文學觀念再推進一層。⁷⁴

此外，文中也透過觀察中國「文學」之起源與衰退，點出三皇時代「其進化之速率誠不可思議」，然而自「秦漢以下遂一滯而不復進，且日有退化之象。豈發洩過甚，極盛者難為繼歟。抑吾國文學之進行循拋物線一達其頂點則反墜歟。」黃人點出中國文學的進化與退化似乎循著拋物線來進行，進退的分水嶺就在秦漢時期。他指出秦漢以上之人，「明於古今治亂之故，天人紛蹟之數，研究一生而有所心得也」，「惟其無文之見，故文有生氣而真」，「無假於造作」；而「秦漢以下之文，可以一言表之曰無乎不假而已。」⁷⁵ 可見黃人以天真與造假來評論秦漢前後之文學，其高下立見。

及至〈文學史上〉的分論裡，黃人延續演進之公理，認為「文治之進化，非直線形而為不規則之螺旋形，……遇有阻力，或退而下移，或折而旁出，或仍循原軌，故歷史之所演，有似前往者，有似後却者，有中止者，有循環者，及細審之，其範圍必擴大一層，其為進化一也。」在文學史的書寫中，黃人跳脫直線進化的線性單一模式，嘗試描繪出文學發展更為多元複雜、多方角力交錯併陳的螺旋形立體模式。其次，中國文學雖「至秦漢後似有中道而畫，一蹶不振之勢」，「其實止者自止，行者自行，退者自退，進者自進。其止也，正其所以行也；其退也，正其所以進也，蓋文學而入于（華離時代），……其進取之手段方式不同，而進取之目的則一也。」由此觀之，黃人不再以表面

⁷³ 黃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子集，頁106。

⁷⁴ 關於黃人《中國文學史》、《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之間的關係，可參見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頁155-192。

⁷⁵ 黃人，〈國文學贅說〉，《東吳月報》第6期，頁3-4。

上簡單的進退行止來論斷文學史的發展，從而肯定不同時代同具進取目的，惟手段不一的歷史規律，有所謂的「華離時代」——以文體的交錯發展來描繪秦漢以降文學的特色：有三唐之駢文、古近體詩；兩宋的語錄、駢偶文、詩餘；蒙元的百種曲、院本與章回小說；明之八股與傳奇。此中最值得注意者，除了黃人嘗試為不同時代標舉出代表文體，更有對小說、戲曲的重視。

黃人認為元人百種曲及西廂、琵琶諸院本，「不可謂非文界之異軍蒼頭也」，然院本雖專取前代小說故事為題，而「科白未工」，至「本事之精神曲折不能熨貼，而章回小說一派出焉。」至此，則「小說之能掃蕩唐宋歷來之稗官家，猶院本之能掃蕩漢魏以下一切之樂府焉」，若能綜合院本、小說之長，「當不令和美兒〔Homer，今譯荷馬〕、索士比亞專美於前也。」⁷⁶ 可知黃人對於蒙元院本、小說的重視。至明代傳奇，黃人更推崇其為「化合蒙兀之曲文小說而成一種特別之文體」，不僅「淘汰虜族儉荒之氣，而飾之以詞藻；芟剪稗乘叢蕪之觀，而納之以科白」，在內容上更能兼容「朝政之得失。身世之悲愉、社會之澆醇衰盛」，因此，「萬態著為傳奇，以抒寫之在文學界上，其資格為最下，而其容積則最富（與歷史等），律令亦最嚴（與八股等），應用於社會之力量，則又最大。」⁷⁷ 在內容與形式上鑄鑄曲文小說精華而集大成。

此外，黃人尤其標舉傳奇的抒情性與作為表演藝術之特色：

蓋尋常文學，惟影響於文學界中，即通俗小說亦必稍通文學者始有影響，若夫傳心情於絃管，窮態度於觀聽，使死的文學變為活的文學，無形的文學變為有形的文學，則傳奇之特色焉。⁷⁸

⁷⁶ 黃人，〈文學史上 節錄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東吳月報》第 11 期，頁 1-2、4-5。

⁷⁷ 黃人，〈文學史上 節錄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東吳月報》第 12 期，頁 1-2。

⁷⁸ 黃人，〈文學史上 節錄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東吳月報》第 12 期，頁 2。

由以上討論，黃人對於文學科的命名、文學史演進之公理、以及以文類區分朝代特色、標舉小說、戲曲之價值等，比起同時代其他知識份子（如林傳甲）更可見其先進而現代的眼光，相信透過課堂傳授與校刊刊行，必然產生過一定的影響。

2.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1910）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為 1904 年林氏於京師大學堂優級師範館講授中國文學課程時所寫的授課講義，初由《廣益叢報》連載八月有餘（自 1910 年 4 月 19 日至 1911 年 1 月 10 日），至 1910 年 7 月則由武林謀新室出版單行本。此書自 1930 年代以來就被評為中國人自撰的第一本「中國文學史」，但似乎「譏」多於「譽」。⁷⁹ 對於此書，學界已有多篇專論探討，⁸⁰ 主要論點為：其一，此書基本上符合清廷學部所頒發〈奏定大學堂章程〉的「研究文學之要義」，是一部「貫徹教學綱要的教科書」，⁸¹ 在實際規劃方面亦可見其調整「變通」；⁸² 其二，此書雖稱「將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焉」，但實際比對，笹川對於元明以來戲曲小說的標舉，⁸³ 正是現代文學觀念得

⁷⁹ 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入東華大學中文系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4 年），頁 72-74。

⁸⁰ 如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入陳國球等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 年），頁 345-350；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頁 23-101。

⁸¹ 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頁 346、350。

⁸² 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甲《中國文學史》〉，頁 85-88。

⁸³ 在〔日〕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中，第七期金元文學之第二節有「小說及戲曲之發展」，第八期明朝文學之第三節有「小說與戲曲」，第九期清朝文學之第二節有「小說與戲曲及批評」。詳〔日〕笹川種郎，〈目次〉，《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 年），頁 5-6。

以凸顯的重要文學史觀，在明治時期眾多的《支那文學史》書寫中尤其具特色，⁸⁴ 但林傳甲對此則批評：

日本笹川氏撰《中國文學史》，以中國曾經禁燬之淫書，悉數錄之。不知雜劇、院本、傳奇之作，不足比於古之《虞初》，若載於風俗史猶可。（坂本健一有《日本風俗史》，余亦欲萃「中國風俗史」，別為一史。）笹川載於《中國文學史》，彼亦自亂其例耳。況其臚列小說戲曲，濫及明之湯若士、近世之金聖歎，可見其識見污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⁸⁵

林傳甲認為「雜劇、院本、傳奇之作」不比古之《虞初》，載之風俗史猶可，置於文學史中，則是自亂體例；況又臚列小說戲曲，「可見其識見污下，與中國下等社會無異」。可見林傳甲所撰《中國文學史》，雖號稱「仿日本笹川種郎中國文學史之意以成書」，⁸⁶ 但書中對於「文學」的認知，主要仍是「詞章之學」，再擴及文字學、語法學以及經學，可說仍是中國傳統廣義的文學內涵，反不及前述梁啟超、王國維、黃人等人受到東西方文學觀點啟發，所展現的新文學眼光。

（三）基於「發明國學，保存國粹」之宗旨，引導「文學」觀念重返中國傳統經史

在數據庫的檢索中，約在 1905 年後出現不少「文學」用例的文章主要來自《國粹學報》，值得注意。《國粹學報》為「國學保存會」的機關報，該會乃 1905 年元月由劉師培與鄧實（1877-1951）、黃節（1873-1935）於上海發起成立，至 2 月 23 日《國粹學報》創刊，由

⁸⁴ [日]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資料篇，頁 55-56。

⁸⁵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 年，據 1914 年武林謀新室校正六版影印），第 14 篇，頁 182。

⁸⁶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第 1 篇，頁 1。

鄧實、章炳麟、劉師培、陳去病(1874-1933)、黃節、黃侃(1886-1935)、羅振玉等人擔任編輯，鄧實則為總纂。該刊〈發刊詞〉稱「學術，所以觀會通也。……無如近世以來，學鮮實用，自攷據之風熾，學者祖述許鄭，以漢學相高」，「而一二為宋儒學者，又復空言心性，禪寂清譚」，使學術淹沒，誰之咎歟？加之「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震旦文明不絕一綫，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士生今日不能籍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暫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闢，徒咎年凶；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於是欲「師三賢〔指王陽明、顏元與戴震〕之意，綜百家之長以觀學術之會通」。⁸⁷ 在〈略例〉中亦明白揭示「以發明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⁸⁸ 以下試從「文學」用例之中帶有新意者進行探討，⁸⁹ 計有劉師培所撰〈南北文學不同論〉、〈論近世文學之變遷〉與章太炎〈文學論畧〉三篇，以明「文學」之義與文章內涵。

1. 劉師培：〈南北文學不同論〉(1905)、〈論近世文學之變遷〉(1907)

劉師培所撰著的兩文，時間雖近，但在〈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劉氏還清楚引用明治漢學家的「南北分宗論」，至〈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則變為批判日本文體相習成風，反使中國文派無復識辨的復古姿態。

〈南北文學不同論〉是《南北學派不同論》的部分章節，《南北學派不同論》最初刊登於《國粹學報》，以四期分別連載（1905年，第1卷第2、6、7、9期），後亦集結成書。⁹⁰ 該文先以「總論」述其

⁸⁷ 〈國粹學報發刊詞〉，《國粹學報》第1年第1號（1905年2月23日），收入王雲五主持，黃節等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冊1，頁7-8。

⁸⁸ 〈國粹學報略例〉，頁10。

⁸⁹ 《國粹學報》收有羅敦融（1872-1924）〈文學源流〉一文，共分六期刊登，但全文除運用進化論梳理中國文學源流，主要論點仍未脫傳統經史子集規範，故不進行討論。

⁹⁰ 劉光漢（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總論〉，《國粹學報》第1年第2號（1905年3月25日），頁8。但後面所連載的三篇分論以及日後專書，總標題皆改為〈南北學派不同論〉。劉師培，

綱，下文則帶出一系列學理的南北分野考，依次為：南北諸子學不同論、南北經學不同論、南北理學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就以上分類，已見「諸子學」、「經學」、「理學」、「考證學」與「文學」是處於並列的狀態，顯見劉氏已將「文學」區分於「諸子」、「經學」與「理學」而獨立成一範疇。「總論」述及，中國因天然的江河地理分野，加上交通未廣，因此「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加之「漢族初興肇基西土，沿黃河以達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黃河南北，厥後戰勝苗族，啓闢南方，秦漢以還閩越之疆始為漢土，故三代之時學術興於北方，而大江以南無學。魏晉以後，南方之地學術日昌，致北方學者反瞠乎其後。」究其原因，主要是五胡亂華後，中原甲姓避亂南遷，使「冠帶之民，萃居江表」，其次則以北方水利先興後淤，後世以降「荆吳楚蜀之間得長江之灌輸，人文蔚起，迄於南海不衰」，「故就近代之學術觀之，則北遜於南；而就古代之學術觀之，則南遜於北」，「蓋北方之地乃學術發源之區也。」⁹¹ 這種藉地域而氣候，由風土而人民的自然發展，再結合中國政治之更迭，歷史興滅之論述，顯然是十九世紀以來盛行於歐洲與日本的泰納「種族、環境、時代」的國民文學論述框架，此時已成為劉師培建構中國學術的重要資源。

在〈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中，劉氏先從南北聲音的起源開始，認為神州語言可析分為北方語言與南方語言，「聲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與北方迥別」；⁹² 再就地理環境、人民性格與文學的關係論及：

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間，多尚實際；南方之地水勢

《南北學派不同論》，《兩漢學術發微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南北學派不同論》（臺北：國民出版社，1959年），頁22-28。

⁹¹ 劉光漢，〈南北學派不同總論〉，頁8。

⁹² 劉光漢，〈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國粹學報》第1年第9號（1905年10月18日），頁8。

皓洋，民生其際多尚虛無。民崇實際，故所著之文不外記事、析理二端；民尚虛無，故所作之文或為言志、抒情之體。⁹³

有此基本原則後，下文則以中國最早古籍六藝為發端，依先秦至清中葉的朝代遞嬗，論析各文類的南北發展，此中固有符合南北地域之分者，如言及北方的《尚書》、《春秋》與《禮》、《樂》等經，「記事之文此其嚆矢」；或者言屈原之文「符於二南之比興；而叙事紀遊，遺塵超物，荒唐譎怪，復與莊列相同。南方之文此其選矣」。但也有不少作品不甚符合南北分論者，如詩三百中之周南、召南詩篇來自周召之地，即在南陽（今河南西北方）、南郡（今湖北荊州一帶）之間，雖然相對位置比起采得十五國風的河、濟之間（兗州，今山東西部、河南東北部一帶）稍微偏南，但就整體中國地理而言，還是在北方，但其評論則顯然在詩體本身的特色加上了「南方文學」的附會，而有了如是論述：「故二南之詩感物興懷，引辭表旨，譬物連類，比興二體，厥製益繁，構造虛詞，不標實跡，與二雅迥殊」云云。

在此文中，劉氏實已注意到「魏晉之際文體變遷，而北方之士侈效南文」，至左思（約 250-305）詩賦，則「北方文體，至此始滄」。到了晉朝如張華（232-300）、潘岳（247-300）、摯虞（約 250-約 300）之文尤「漸尚鋪張」，使「文體由北趨南之漸也」。⁹⁴ 但劉氏仍一本南北分宗之旨，將文學的探討延伸至清代中葉。直到十多年後劉氏於北京大學講學，⁹⁵ 才明確提出〈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文中提及雖然《隋書·文學傳》已論及「南北朝文體不同」，但此「非定論也」，如「潘岳為北人，陸機為南人，何以陸質實，而潘清綺？後世學者亦各從其所好而已，若必謂南北不同，則亦祇六朝時代

⁹³ 劉光漢，〈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頁 8。

⁹⁴ 劉光漢，〈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頁 10-11。

⁹⁵ 劉師培在北京大學的講學時間為 1917 年秋至 1919 年 11 月 20 日，後因肺病病逝。詳萬仕國編著，《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 年），卷 3，頁 262、275。

為然」，不僅歷代之文南北之分不甚嚴明，「倘能於古人文字精勤鑽研，無論何人均不難趨步」，「文學奚必有關地理哉？」一代傑出之文人「非特不為地理所限，且亦不為時代所限。」因此劉氏提出「窮源竟流功夫」，「上下貫通，乃克參透一家之真相。」⁹⁶ 可知劉氏對於中國文學研究的眼光，至此已能修正調整明治漢學者的論述，進而提出更為具體可行的研究方法。

此外，文中實際探討文類，除有先秦之詩、書、易、禮、春秋、諸子、楚騷外，兩漢至清中葉的詩、賦、駢、散、史遷之作、劇曲等皆有南北分宗之探討，同時也嘗試辨析其源流，已頗能呈現今日文學史的視野。

另在〈論近世文學之變遷〉中，劉氏主要探索近世文學衰頹的原因。文中提出唐以前的士大夫皆能工於文與修辭，學優而文絀的情況並不曾耳聞，但士夫工文修辭的情況似乎自宋而有了變化，「至宋儒立義理之名，然後以語錄為文，而詞多鄙倍。至近儒立考據之名，然後以註疏為文，而文無性靈。」加上清代兩大學派，「一曰宋學，一曰漢學，治宋學者，從語錄入門；治漢學者，從注疏入門，由是以語錄為文，以注疏為文，及其編輯文集也，則義理考訂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為文學者，互相因襲」，於是而有「學日進而文日退」的現象。「古人謂文原于學，汲古既深，摛辭斯美」；「今則不然，學與文分，義理、考證之學迥與詞章殊科，而優于學者，往往拙于為文」，使得文苑、儒林、道學遂一分而不可復合，這是「近世之異於古代者也」，也是劉師培對於近世文學的主要批評。

⁹⁶ 劉師培講，羅長培記，〈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頁51-53。此文由劉師培主講，學生羅長培（1899-1958）筆記而成，因錢玄同（1887-1939）編輯《劉申叔遺書》時未及收入，後有獨立出版社於1945年另行出版。據《劉師培年譜》記載，劉氏於北京大學講學期間，主要擔任課程為「中國文學」（文）與「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學史），「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顯然是「中國文學」的內容。詳萬仕國編著，《劉師培年譜》，卷3，頁262。

劉氏進一步點出近世學人對於「詞章」的兩種看法：「一曰鄙詞章為小道，視為雕虫小技，薄而不為；一以考證有妨於詞章，為學日益，則為文日損。」可見「文學之衰，不僅衰于科舉之業也，且由于實學之昌明。」由此論述邏輯，則可知近世文學之衰，與近世學人以語錄、考據為文，鄙斥詞章相關。由文中考察變遷之大略，又以「乾嘉之際，通儒輩出，多不復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趨于朴拙，不復發于性情。然文章之徵實，莫盛于此時。」⁹⁷ 而此時也是「詞章」最受忽略，文學日趨衰弊之時。

劉師培在探討近世「文學」之變遷時，其文理頗以「實學」與「詞章」對舉，指出抒寫性靈者方為「文學」之依歸。這樣的觀點我們可在劉氏同年發表的〈論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一文中，得到進一步的闡發。文中提及，「貴真者，近於徵實」，「貴美者，近于飾觀」，至於「徒尚飾觀，不求徵實」者，此美術之學遂與徵實之學相違也。究其原因，乃在於「美術者以飾觀為主者也，既以飾觀為主，不得不遷就以成其美。」而中國美術中，與徵實之旨相背者，主要有書法、詞章兩端。可知劉氏對於「詞章」的認定，乃在廣義「美術」之範疇，是貴美而不求徵實。證之後文，有所謂「用字之訛」、「造語之訛」、或「逞句法之奇」而有「造句之訛」，「用事不考其源」、「記事詞過其實」等特徵，最後總結：「蓋美術以性靈為主，而實學則以考覈為憑」，可知劉氏對於「文學」的追求，乃在於強調貴美與性靈等層面，與黃人實有會通之處，已近今日對於「美文」、「純文學」的看法。⁹⁸

文後，劉氏有感於近歲作文者多師龔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然襲其貌而遺其神」，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於義

⁹⁷ 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國粹學報》第3年第1號（1907年3月4日），頁1-2、4。

⁹⁸ 劉師培，〈論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國粹學報》第3年第8號（1907年9月27日），頁5-6。

法，未能神明變化」，故曰：「文學之衰，至近歲而極」，以致有日本文體之輸入中國，其始也「譯書撰報，據文直譯以存其真」，未料後生小子「厭故喜新，競相效法」，反致「前賢之文派無復識其源流」，「謂非中國文學之厄歟！」⁹⁹ 晚清以來受到日本文體影響，透過辦報撰文，不斷譯介東西洋新思想者可以梁啟超的「新文體」最具代表，然其文「務為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加上「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雖說「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¹⁰⁰ 但藉由新文體以承載新思想已是大勢所趨，劉師培雖然批判晚清士人數典忘祖，反使「冗蕪空衍，無文法之可言」的東籍之文相習成風，¹⁰¹ 固然體現「國學保存會」力陳國粹精義，求能撥亂反正的立場，但最終仍難抵時代潮流之趨向。

2. 章太炎：〈文學論略〉（1906）

晚清時期的章太炎其政治立場從維新轉為革命，自 1903 年章氏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為鄒容（1885-1905）《革命軍》做序而引發「蘇報案」，終至入獄三年。1904 年後，排滿與古文經的立場日趨明確。再經 1906 年赴日參與「同盟會」，擔任《民報》主筆，而有「用國粹激動種性」¹⁰² 的主張，使得文學觀也從探索縱論東西學新知，轉為保存國粹的姿態，在先後發表的〈文學說例〉與〈文學論略〉兩文中，恰可見其端倪。〈文學說例〉已在前文《新民叢報》脈絡中探討，故略，在此進一步說明發表於《國粹學報》的〈文學論略〉。¹⁰³

⁹⁹ 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頁 4。

¹⁰⁰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頁 85-86。

¹⁰¹ 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頁 4。

¹⁰² 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77 年），冊上，頁 272。

¹⁰³ 該文原名〈論文學〉，與〈論語言文字之學〉、〈論諸子學〉同收入章太炎，《國學講習會略

在此文中，章太炎重提「文學」的定義，文曰：

何以謂之文學？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謂之文。而言其采色之煥發，則謂之彪。《說文》云：文，錯畫也。象交文彪彘也。彘，有彪彰也。或謂文章當作彪彰，此說未是。要之，命其形質，則謂之文；狀其華美，則謂之彪。凡彪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彪，是故研論文學，當以文字為主，不當以彪彰為主。¹⁰⁴

在此文中，章氏透過重返中國傳統的文史脈絡，將「文」、「文學」的意義重作釐清，稱「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而「論其法式，謂之文學。」一是著於竹帛的文字，一是論述文字的法度或準則的學問，兩者顯然不同。所謂「文」又可含納文理、文字、文辭等內涵。此外，章氏尤在「文」與「彪」兩字間進行區分，認為「命其形質，則謂之文」，「狀其華美，則謂之彪」。而「彪」者尤其「言其采色之煥發」，也就是有文采之意，可知「文」、「彪」兩字有內在「形質」與外在「華美」的根本差異。再者，「凡彪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彪」，可知「彪」具有「文」的內在形質，然而成「文」者則不必然皆具華美之文采。因此章氏提出：「是故研論文學，當以文字為主，不當以彪彰為主。」其重文之本質更甚於外在文采的姿態十分明

說》（東京：秀光社，1906年）。此書出版同時，三文亦在《國粹學報》上連載，〈論文學〉則改名為〈文學論略〉（第21-22期）或〈文學論畧〉（第23期）。此三文分論語言文字、文學、諸子學，日後則為《國故論衡》上中下三卷總論的主要內容。詳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收入夏曉虹等著，陳平原主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頁248。連載見章絳（章太炎），〈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2年第9號（第21期）（1906年10月7日），頁4-7；第2年第10號（第22期）（1906年11月6日），頁1-5；第2年第11號（第23期）（1906年12月5日），頁1-4。

¹⁰⁴ 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2年第9號（第21期），頁4。

確。

其次，在此文中，章氏花了不少篇幅檢討兩大論點：一、傳統文論所提出的文筆之分、有韻無韻之別，主要批評對象明為阮元（1764-1849）的文筆論，實則為劉師培；二、當時受歐日影響的文辭學說不同論。¹⁰⁵ 章氏以為「前之昭明，後之阮氏，持論偏頗，誠不足辯」，學說與文辭對立之說規模雖稍寬博，「而其失也惟以彰彰為文，而不以文字為文。」《論衡》所說雖「略成條理」，惜哉「但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¹⁰⁶ 因此章氏重新釐定文辭區分標準如下：

吾今為一語曰：一切文辭（兼學說在內）體裁各異。以激發感情為要者，箴銘哀誄詩賦詞曲雜文小說之類是也；以濬發思想為要者，學說是也；以確盡事狀為要者，歷史是也；以比類知原為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為要者，公牘是也；以本隱之顯為要者，占繇是也。其體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其為文辭則一也。¹⁰⁷

由章氏重新析理的六大體裁中，我們可看見現代的文類觀正在取代傳統的文筆、韻散等分類方法，尤以前三者為甚，為首第一個文類特徵，就是「以激發感情為要者」，此為日後文學史對「文學」所做最清楚可辨的定義。¹⁰⁸ 其後所舉為「箴銘哀誄詩賦詞曲雜文小說之類是

¹⁰⁵ 詳參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頁 247-259。

¹⁰⁶ 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 2 年第 10 號（第 22 期），頁 1。

¹⁰⁷ 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 2 年第 9 號（第 21 期），頁 7。

¹⁰⁸ 如謝无量（1884-1964）《中國大文學史》所舉「外國學者論文學之定義」，有龐科士（Pancoast, ?-?）著英國文學史，論文學定義最詳審，其言曰：「文學有二義焉。（甲）兼包字義，統文書之屬。……（乙）專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娛志為歸者，乃足以當之。……文學描寫情感，不專主事實之智識，世之文書，名曰科學者，非其倫也。雖恆用歷史科學之事實，然必足以導情陶性者而後采之。」詳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 年），卷 1，頁 3-4。

也」，這是章氏唯一未做進一步歸納者，其主要內容實已類於今日所謂的應用文與狹義「文學」之範疇。其次，「以濬發思想為要者」的「學說」，更是充斥在晚清各政論報刊用以介紹東西洋最新思想學說的關鍵詞。其三，「以確盡事狀為要者」的「歷史」，則在 1902 年起有梁啟超展開的「新史學」論述揭開中國傳統史學朝向現代史學轉型的序幕。¹⁰⁹

再者，章太炎批評昭明太子蕭統（501-531）、阮元「持論偏頗，誠不足辯」，唯王充（27-約 97）《論衡》所說略成條理，但只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故而透過廣博的文字學知識追溯文學之原，論證「文字初興，本以代言為職，而其功用有勝於言者」，此中，「凡無句讀之文，皆文字所專屬也。」「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場也。」¹¹⁰ 因此特製一表來說明「文學各科」，¹¹¹ 並凸顯「無句讀文」之特色。在此新訂的「文學各科」共分兩列十六科，其一為無句讀文，以下分列圖書、表譜、簿錄、算草四科；其二為有句讀文，以下再分（一）有韻文，共列賦頌、哀誄、箴銘、占繇、古今體詩、詞曲六科；（二）無韻文，共列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章氏透過溯本的方式羅列此文學分科後，接下來則是將所有傳統經史子集全部打散，逐一納入此一新的文學分科，列舉如下：

以此分析，則經典亦當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占繇科也；如詩者，賦頌科也；如尚書者，歷史科之紀傳類、紀事本末類、公牘之詔誥類、奏議類、告示類也；……至于正史一書之中分科各異，如紀傳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書志則典章科之書志類

¹⁰⁹ 詳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41 期（2003 年 9 月），頁 181-213。

¹¹⁰ 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 2 年第 10 號（第 22 期），頁 2。

¹¹¹ 圖一：章太炎所繪製「文學分科圖」，請見《清華中文學報》電子期刊網頁，網址：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189901_r3772.php?Lang=zh-tw

也；……文人所作總集別集之屬，大抵多在雜文科中。……凡自成一家之書名為諸子，……自今以後科學漸興，則諸子所包，其數將不可計。儒家、道家同為哲學；墨家、陰陽家同為宗教，似亦不須分立矣。……今之文評，若《文心雕龍》是也；其關於欵識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關於古今體詩者，若《詩品》是也；其通評文史者，若《文史通義》是也，此則與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皆相涉入者也。¹¹²

由以上新的分類可知，博學的章太炎正在透過最復古的姿態，對過去經史子集諸多概念以溯源的形式不斷回歸，推尋本義，待得各歸本位後，又透過當時最為時新的文類觀予以打散並重組，使得章氏的「文學」探源一方面展現出最本質的回歸，但同時也以嶄新的分類（如學說、歷史、哲學、宗教等）方式對所有舊文類進行洗牌，重新整併再劃入全新的知識領域，其中中國傳統最受尊崇的「經」部幾乎完全瓦解，已零碎散入不同分科，相對而言，「史」、「子」、「集」三部則仍以「歷史」、「學說——諸子」、「雜文」的形式完整留存。再以現代眼光來看，章氏的分類還是在傳統知識（有韻、無韻）的基礎上展現出新的分科，以致有新舊雜陳、分類粗疏的狀況。這樣的過渡現象，很快就在日後的文學史書得到修正，如在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1918年由中華書局出版，至1940年已印製第18版）中，章氏復古的文質之說並未得到標舉，但所畫「文章體製表」與經典如何散入各科之學說卻得到彰顯，此時謝无量已藉由歐學東來的觀念，所謂「言文學者，或分知之文、情之文二種」，進一步將章氏列表再作歸納，認為「大抵無句讀文及有句讀文中之無韻文，多主於知與實用；而有句讀文中之有韻文及無韻文中之小說等，多主於情與美，此其辨也。」¹¹³可

¹¹² 章絳，〈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2年第10號（第22期），頁4-5。

¹¹³ 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卷1，頁6-9。

見謝无量對於「文學」的觀念已進一步簡化為「知之文」與「情之文」，其中「有韻文」與小說「多主於情與美」，純文學的觀念已昭然若揭。

在文章最後，章太炎重回全文的論述要旨，進一步將「無句讀文」與「文字」之本質進行扣合，其文曰：

既知文有無句讀、有句讀之分，而後文學之歸趣可得言矣。無句讀者純得文，稱文字之不共性也；有句讀者文而兼得辭，稱文字語言之共性也。論文學者雖多就共性言，而必以不共性為其素質。故凡有句讀文，以典章為最善，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尚直截而無蘊藉，此于無句讀文最為鄰近。¹¹⁴

由此可知，章氏將「文」劃分為「有句讀文」與「無句讀文」兩類，此中能體現「文字之不共性」者，也就是「文」之質素者乃在於「無句讀文」，即圖書、表譜、簿錄、算草之屬；而「有句讀文」除有「文」外又兼得「辭」，因此體現出文字語言之共性，此中唯有「典章」、「學說科之疏證類」得以附居其列，符合章氏認同的「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尚直截而無蘊藉」的特點。可知章氏對於「文學」之標準恰與現今所認知的「純文學」、「美文」觀點背道而馳，因此文中不斷提出「魏晉以後珍說叢興，文漸離質」、「一切文辭除小說外，凡敘事者尚其直敘，不尚其比況」等觀點，¹¹⁵ 足見其復古姿態。然而，就在行文的論證過程中，章氏又透過新的歸類邏輯，將傳統經史子集之學全部打散，歸入他所劃定的新的文學分科標準，又可見出章氏藉由復古姿態言說「文學論略」，實質卻又進入最為激進而徹底的摧枯拉朽，其既復古又革新的姿態頗值得玩味。

¹¹⁴ 章絳，〈文學論畧〉，《國粹學報》第2年第11號（第23期），頁1。

¹¹⁵ 章絳，〈文學論畧〉，《國粹學報》第2年第11號（第23期），頁1。

四、小結

本文透過近代報刊數據庫的可觀資料，歸納梳理「文學」兩字在晚清報刊中的運用實例，一方面看到相關論題的討論已是以報刊作為單位，教會或報刊同人之間此呼彼應的集體論述模式，從傳教士主導的《萬國公報》，到知識份子主導的《新民叢報》、《新小說》、《國粹學報》等皆能反映出各報刊的基本立場，使得公諸於眾的論題可在報端持續得到論證、張揚與發酵，而逐步發揮其影響力。其次，「文學」觀念從傳教士到知識份子間的發展，固然有最早的艾約瑟（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在不同報刊間連載流傳，但能夠在中國文化場域實際發生作用者，主要還在於知識份子展現的豐富論述，在本文梳理的三組知識份子中，除有借鑑明治日本與歐西學者的文學、哲學相關論點，而有梁啟超與同人間啟動的新小說論述，對於提升俗文學不遺餘力，或是王國維的慧思獨運，以詞話形式展現現代文學批評的文學小言；再有透過「文學史」課堂的講授，而有國人自編文學史講義的誕生，雖說在研究眼光上有黃人進步，林傳甲保守之別，但透過報刊連載的形式也使「文學」與「文學史」的思辯得到了進一步的傳播與推進，外來視野的參照（尤其是明治漢學家），對於建構中國文學史尤有極大的裨益。另在劉師培與章太炎的「文學」相關論著中，兩人對於「文學」的思考，也從廣泛借鑑日本學者的文學史眼光慢慢轉趨保守，透過「國學保存會」所發起的國粹運動，欲將「文學」觀念重返中國傳統經史，在晚清時局固然展現其反滿的政治姿態與保存國學的努力，但如文中所論，不論是劉師培倡議的「詞章」實以抒寫性靈為依歸，或是章太炎重繪的「文學分科圖」，在貌似批判現今文界的立場中，卻又保守中帶有激進，實已蘊藏了部分現代文學觀念而不自知。

中國「文學」觀念的演進正是在此多元論述，眾聲喧嘩，或進取，或保守的情境中匍匐前進，累積能量，雖說在晚清時期的報刊論述中，

我們尚無法看到「文學」觀念已達到確切落實並穩定的狀態，不同知識份子事實上都在自己所擁有的文化資本基礎上，嘗試對「文學」進行規範與定義，辯說傳統與現代文學觀念的異同。晚清自傳教士至眾多知識份子藉由借鑑他山之石的各種思維路徑與文學實踐，也正清楚體現文學觀念如何由傳統轉型為現代的多聲複調風華。

（責任校對：林琬紫）

引用書目

一、近人論著

- 王永健，《「蘇州奇人」黃摩西評傳》，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0年。
- 王風，〈劉師培文學觀的學術資源與論爭背景〉，收入夏曉虹等著，陳平原主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230-265。
- 甘慧杰，〈點校說明〉，收入〔日〕森有禮（Mori Arinori）編，〔美〕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任廷旭譯，《文學興國策》，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頁1-3。
- 丘為君，〈轉型時代——理念的形、意義，與時間定限〉，收入王汎森等著，《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7年，頁507-530。
- 李爽學，《譯述：明末耶穌會翻譯文學論》，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2年。
- _____，〈八方風雨會「文學」〉，《東亞觀念史集刊》第10期，2016年6月，頁151-177。
- 林傳甲，《中國文學史》，臺北：學海出版社，1986年，據1914年武林謀新室校正六版影印。
- 知拙夫（章太炎），〈致吳君遂等書四〉，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冊上，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卷2，頁75-76。
-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
- 柳無忌、殷安如編，《南社人物傳》，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
- 夏曉虹，〈作為教科書的文學史——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入

- 陳國球等編，《書寫文學的過去——文學史的思考》，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7年，頁345-350。
- _____，〈梁啟超的文類概念辨析〉，收入夏曉虹等著，陳平原主編，《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頁157-186。
- 袁英光、劉寅生編，《王國維年譜長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高津孝，〈京都帝國大學的中國文學研究〉，《政大中文學報》第16期，2011年12月，頁89-111。
- 梁啟超撰，朱維錚導讀，《清代學術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 張灝，〈中國近代思想史的轉型時代〉，《時代的探索》，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4年，頁37-60。
- 章太炎，《國學講習會略說》，東京：秀光社，1906年。
- 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收入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冊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頁269-280。
- 章炳麟著，朱維錚編校，《章太炎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
- 陳平原，〈晚清辭書與教科書視野中的「文學」——以黃人的編纂活動為中心〉，收入陳平原、米列娜(Milena Doležalová-Velingerová)主編，《近代中國的百科辭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155-192。
- 陳玉申，《晚清報業史》，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3年。
- 陳玉堂編，《中國文學史書目提要》，合肥：黃山書社，1986年。
- 陳國球，〈「文學」立科與「中國文學史」——由京師大學堂章程到林傳甲《中國文學史》〉，收入東華大學中文系主編，《文學研究的新進路——傳播與接受》，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公司，2004年，

頁 23-101。

陸爾奎、方毅等編校，《辭源》，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年。

黃克武，〈梁啟超與中國現代史學之追尋〉，《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41期，2003年9月，頁181-213。

黃摩西，《普通百科新大辭典》，上海：國學扶輪社，1911年。

萬仕國編著，《劉師培年譜》，揚州：廣陵書社，2003年。

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論》，《兩漢學術發微論·漢宋學術異同論·南北學派不同論》，臺北：國民出版社，1959年。

劉師培講，羅長培記，〈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臺北：中華書局，1969年，頁51-53。

蔡祝青，〈文學觀念流通的現代化進程：以近代英華／華英辭典編纂“literature”為中心〉，《東亞觀念史集刊》第3期，2012年12月，頁273-333。

黎子鵬編注，《道德除害傳：清末基督徒時新小說選》，新北：橄欖出版公司，2015年。

戴燕，《文學史的權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0年。

〔日〕川合康三編，《中國の文學史觀》，東京：創文社，2002年。

〔日〕笹川種郎，《支那文學史》，東京：博文館，1898年。

〔日〕笹川種郎原著，范迪吉總譯述，《普通百科全書》，上海：上海會文學社，1903年。

〔日〕鈴木貞美著，王成譯，《文學的概念》，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年。

〔日〕藤田豐八，《支那文學史稿 先秦文學》，東京：東華堂，1897年。

〔英〕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著，劉建基譯，《關鍵詞：文化與社會的辭彙》，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03年。

〔美〕韓南（Patrick Hanan）著，徐俠譯，〈新小說前的新小說——傅蘭雅的小說競賽〉，《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頁147-168。

Pfister, Lauren F.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James Legge and the Scottish Protestant Encounter with China; Assessing Confluences in Scottish Nonconformism, Chinese Missionary Scholarship, Victorian Sinology, and Chinese Protestantism*. Frankfurt am Main and New York: Peter Lang, 2004.

二、報刊文獻

〈大英文學武備論〉，《萬國公報》第10年第504卷，1878年9月7日，頁43。

〈文學小史〉，《選報》第6期，1901年12月31日，頁27-28。

〈本報告白〉，《新民叢報》第1號，1902年2月8日，頁1-3。

〈論小說與羣治之關係〉，《新小說》第1年第1號，1902年11月14日，頁1-8。

〈論文學與科學不可偏廢〉，《大陸報》第3期，1903年1月，頁1-5。

〈論支那文學與羣治之關係〉，《湖北學生界》第5期，1903年5月，頁75-78。

〈國粹學報略例〉，《國粹學報》第1年第1號，1905年2月23日，收入王雲五主持，黃節等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冊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10。

〈國粹學報發刊詞〉，《國粹學報》第1年第1號，1905年2月23日，收入王雲五主持，黃節等編，《景印國粹學報舊刊全集》，冊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4年，頁7-8。

王國維，〈文學小言〉，《教育世界》第139期，1906年，頁1-7。

- _____，〈屈子文學之精神〉，《教育世界》第 140 期，1906 年，頁 1-6。
- 章氏學（章太炎），〈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 5 號，1902 年 4 月 8 日，頁 75-80。
- _____，〈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 9 號，1902 年 6 月 6 日，頁 65-70。
- _____，〈文學說例〉，《新民叢報》第 15 號，1902 年 9 月 2 日，頁 49-60。
- 章絳（章太炎），〈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 2 年第 9 號（第 21 期），1906 年 10 月 7 日，頁 4-7。
- _____，〈文學論略〉，《國粹學報》第 2 年第 10 號（第 22 期），1906 年 11 月 6 日，頁 1-5。
- _____，〈文學論畧〉，《國粹學報》第 2 年第 11 號（第 23 期），1906 年 12 月 5 日，頁 1-4。
- 飲冰（梁啟超）等，〈小說叢話〉，《新小說》第 7 號，1903 年 9 月 6 日，頁 165-176。
- 飲冰子（梁啟超），〈飲冰室詩話〉，《新民叢報》第 4 號，1902 年 3 月，頁 99-102。
- 黃人，〈文學史上 節錄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東吳月報》第 11 期，1907 年 6 月，頁 1-8。
- _____，〈文學史上 節錄正科第一年文學講義〉，《東吳月報》第 12 期，1907 年 7 月，頁 1-8。
- _____，〈文學史上〉，《東吳大學堂學桴》第 2 年第 1 期，1907 年 11-12 月，頁 15-20。
- _____，〈國文學贅說〉，《東吳月報》第 6 期，1906 年 11 月，頁 1-7。
- _____，〈國文學贅說〉，《東吳月報》第 8 期，1907 年 1 月，頁 1-4。

新小說報社，〈中國唯一之文學報《新小說》〉，《新民叢報》第 14 號，
1902 年 8 月 18 日。

楚卿（狄葆賢），〈論文學上小說之位置〉，《新小說》第 7 號，1903 年
9 月 6 日，頁 1-7。

葉瀚，〈文學初津〉，《蒙學報》第 5 期，1897 年 12 月 24 日，頁 37-
40。

劉光漢（劉師培），〈南北學派不同總論〉，《國粹學報》第 1 年第 2 號，
1905 年 3 月 25 日，頁 8。

_____，〈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國粹學報》第 1 年
第 9 號，1905 年 10 月 18 日，頁 8-12。

劉師培，〈論近世文學之變遷〉，《國粹學報》第 3 年第 1 號，1907 年
3 月 4 日，頁 1-4。

_____，〈論美術與徵實之學不同〉，《國粹學報》第 3 年第 8 號，1907
年 9 月 27 日，頁 5-6。

奮翮生（蔡鐸），〈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 1 號，1902 年 2 月 8
日，頁 79-88。

_____，〈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 3 號，1902 年 3 月 10 日，頁
65-72。

_____，〈軍國民篇〉，《新民叢報》第 7 號，1902 年 5 月 8 日，頁 67-
72。

〔英〕艾約瑟（Joseph Edkins），〈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六合叢談》
第 1 號，1857 年 1 月 26 日，頁 4-6。

_____，〈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申報》第 840 號，第 4-5 版，1875
年 1 月 20 日。

_____，〈希臘為西國文學之祖〉，《萬國公報》第 7 年第 324 卷，1875
年 2 月 20 日，頁 333。

〔英〕傅蘭雅（John Fryer），〈求著時新小說啓〉，《萬國公報》第 77

卷，1895年6月，頁13。

_____，〈時新小說出案〉，《萬國公報》第86卷，1896年3月，頁30-31。

〔美〕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文學興國策序〉，《萬國公報》第88卷，1896年5月，頁3-6。

_____譯，〈俄國文學考略〉，《中西教會報》第6卷第63期，1900年3月1日，頁10-11。

三、網路資料

全國報刊索引，http://www.cnbkysy.cn/shlib_tsd/product/detail.do?productCatId=6，瀏覽日期：2014年12月15日。

The Modernization of Literary Concepts: A Study on the Usage of “Wenxue” in Late Qing Journals

Chu-Ching Tsai *

Abstract

The last thirty years of the Qing, which spanned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s been referred to as the transformational era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whether it was the media that was used to disseminate thought 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ought itself, there were revolutionary changes. This article uses “Wenxue” 文學 (literature) as a keyword, the domain of late Qing journals as the subject of study, and investigate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terary concepts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practical use of “Wenxue” in late Qing journals. The article divides this thirty year period into two parts on the basis of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journals: prior to 1901, “Wenxue” related discourse was primarily dominated by missionaries; however, from 1902 onwards, it is clear that Chinese intellectuals took control of it. In addition, the discourse on “Wenxue”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major categories. The first, which referenced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Meiji Japan and Europe to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refl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is represented by Liang Qichao 梁啟超 and Wang Guowei 王國維. In the second, “Wenxue” was defined through self-edited textbooks compiled by individuals such as Huang Ren 黃人 and Lin Chuanjia 林傳甲. The third category revolved around the ideal of “inventing national learning, preserving national essence,” and it was championed by scholars such as Liu Shiwei 劉師培 and Zhang Taiyan 章太炎 who sought a traditional ground for “Wenxue” in the Chinese classics and histories. Through these late Qing intellectual debates, a solid foundation was established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concepts related to “Wenxue” and the writing of literary history, a foundation that continued to be developed by future generations.

Key words: “Wenxue” 文學 (literature), Liang Qichao 梁啟超, Wang Guowei 王國維, Huang Ren 黃人, Liu Shiwei 劉師培, Zhang Taiyan 章太炎

